

城市中产阶层返乡的乡村社区教育实践 ——以明光村为例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Practice for Returning Urban
Middle Class: A Case Study of Mingguang Village**

张传月 (Zhang Chuanyue)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内容提要: 当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乡村成为城市人的向往之地,返乡在城市之中成为一种新的风尚。本文以四川省C市明光村为乡村社区教育研究个案,探讨城市中产阶层返乡背景下的乡村社区教育实践。笔者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法,综合运用访谈、民族志、叙事研究等方法,观察记录2015—2017年社区变迁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图景,从空间视角介绍社区生活发生的场域,并对在这一场域内发生的正式与非正式教育活动分别进行介绍,力图回归社会生活本身来重新理解社区教育的本质,探寻社区生活环境如何激发各主体的内在学习动力。研究发现,村庄公共性的发展促进了社区融合,村庄的物理公共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活动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原有村庄的日常生活,多元文化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为新老村民日常生活上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社区教育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生活、促进社区认同和构建共同体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 乡村社区; 社区教育; 公共生活; 质性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Abstract: A new situation has emerg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e countryside has become a yearning for urban people who treat returning to hometown as a kind of fashion. This paper takes Mingguang village in C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 case of rural community education study , and draws on anthropological field survey methods ,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interviews , ethnography , narrative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village from 2015 to 2017.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ield of community life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 discusses what happens in this community , and introduces 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eparatel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turn to social life itself to re-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 explore how the community living environment stimulates the internal learning motivation of various subj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publicity promotes community integration , the physical public spac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activities it carries greatly enrich the daily life of the original village , and the open public space of the multi-culture provides a huge spac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new and old villagers. Besides , commun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encourage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life , promote community identity and build a community.

Key words: 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education; public life; qualitative study

一、引 论

很多城市人关心乡村前途，试图发掘蕴含于乡土之中的经济、文

化、社会价值，多年努力探索回归乡村之路，然而收效甚微。回归乡村，如何定义乡村？谁回归乡村？回归谁的乡村？因为乡村范围甚广，来自不同村庄的城市人如星火散布于全国各地，孤注一掷回到乡村的青年的一腔热情多因家乡物理空间限制、当地发展动力不足、留守居民漠视旁观等多种复杂情况而逐渐熄灭。人们共同生活，但社区的联结断裂、共同利益消失，这是乡村社区无法发展的根本原因。个体回归乡村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力量尚很薄弱，现实压力巨大。由此可见乡村的未来发展并非个体返乡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乡村发展是系统性问题。

然而，亦有一批具有知识、能力和视野的城市中产阶层返乡，新村民的入住使原有村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本文所指“城市中产阶层”参考了各类研究报告对于“新中产”的定义，以学历、收入、居住位置进行界定，即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一线城市年收入30万元及以上、其他城市年收入20万元以上，常年定居于中国大中型城市，拥有固定居所/房产的城市居民。本文以“新村民”指代以购买土地建造房屋、租赁房屋等方式获得乡村在地生活空间的城市自然人、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新村民”在村庄经营日常生活或自己的文化产业。“老村民”则特指出生于该村，如今仍居住生活在村庄以及外出务工但会定期回村的村原住民。所谓“返乡”并非指回到故乡，而是泛指由城市回到乡村。

物理空间距离城市不远且经济发展相对处于中上水平的村庄，成为连接城乡的过渡空间。本地居民因经济、生活水平适中而并不急于进入城市发展，同时因城乡距离适中，对新资讯、动态的接受度高，亦不拒绝新变化的城里人留下来，便成了新村民，原本的乡村社区在新村民加入之后变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作为乡村社区共同的主人，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

在充分尊重农业基础的前提下，新村民带来新的生活理念，体现在文化、旅游、康养、教育等方面。他们将城市生活的各种经验揉进土地，重塑社区。新乡村场景下的文化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命影

响生命的活动过程，并潜移默化地重塑了社区生活图景。新的社区不再闭锁，而是通过新老村民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共融、与现代社会同步发展的新景象。这类乡村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超越过往研究所讨论的“乡村社区”，它是一个乡村地区的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的新型社区，新老村民带着各自沉淀的生活阅历重新组合，在日常交往中彼此学习借鉴、共同成长。乡村社区在新的时代受到多元主体的共同关注。在回归乡村后的建设之路上，各类主体皆跳出“扶贫”的视角，将乡村视为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巨变的场域，关注乡村社区的重构，回归社区教育的本质。探索新的生活共同体的日常生活是社区教育研究在新时代的新路向。

杜威认为，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教育哲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非正规的和正规的、偶然的和有意识的教育形式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有这样两种知识：一种是人们自觉地学得的知识，这是通过特殊的学习任务学会的；另一种是他们不自觉地学得的知识，他们通过和别人的交往来吸取知识，养成自己的品性。避免这两种知识之间的割裂，成为发展专门的学校教育的一个越来越难以处理的任务（杜威，2015）¹⁰⁻¹⁴。中国当代乡村社区呈现的新型图景中，乡村作为发展空间接纳多元主体进入，原有的乡村社区随着新村民的进入而成为“新”的乡村社区，社区结构在人来人往之中流动变化，新的社区格局在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接受变化、给新社区的形成以空间，在自发的交往互动中交换经验、唤醒学习热情，让学习自然发生，使社区内的各利益群体主动在学习实践中寻求进步，是营造社区学习环境的艺术，亦是社区治理的艺术。

（一）文献综述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普遍语用学”是所有交往行为达成理解与共识而有效运用语言行为开展沟通、形成共识的具有普

遍性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如果不是走向封闭与分裂,就只能在交往的过程中寻求团结,而只有通过交往理性才能实现最终的团结目的。“客观真理”让位于“交互主体性的真理”,主体间通过理性平等对话,正视冲突,在相互尊重的非强制基础上反复论证,以达成最终的共识(王家峰,2019)。

美国著名成人教育理论家麦基罗受交往行为理论启发提出成人质变学习理论。他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质变学习理论同属重构理论,试图探讨语言、认知和道德发展以及人类交流本质的普遍条件和规则,质变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解释成人学习过程的一般结构、维度和动力性。他提出了“意义图式”与“意义观点”这两个概念,“意义图式”指既有的价值观、概念、思维习惯在具体应用中被歪曲的影响,“意义观点”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外在文化影响与内在心理假设的共同作用,因此而形成的固定不变的思维习惯(麦基罗,2018)。成人的思维习惯形成后,便很难尝试改变。当既往的意义观点受到新的现实生活冲击而无法解决当下问题时,成人便会反思自我认知方式,重新审视自身看待世界的观点,在反复论证中已实现“观点的质变或世界观的转变”,这一反复论证与克服既往经验的过程即是学习。当代社会文化力量鼓励批判性反思与理性话语,因此有了更大的机会促成质变学习,交往学习中平等理性的理想对话情境是确保观点质变理性化的前提,通过交往互动和对话来辨识并消除潜在的影响障碍以最终实现成人的启蒙和解放(刘志丹,2016)。

赵旭东等人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当今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传统村落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并存、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并置、传统礼俗社会和现代法治社会共荣的图景和画面(赵旭东等,2017)。尹广文认为,当代中国乡村秩序的建立主要受“内生性秩序”与“行政性嵌入性秩序”影响,即乡村内部受到长久以来自身运行的一套逻辑与乡村社会外部的力量,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党和国家及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者的行政嵌入式逻辑的共同作用。他

认为后者有时形成决定性变革力量，而这两种力量在村落中的博弈与整合恰恰发生在村落日常生活实践的公共场域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村落的公共场域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村头公共舆论场，即村民三五成群在村内公共空间进行的日常闲谈；另一类为村庄红白喜事，即有组织的正式的仪式性事件，以家庭户为单位建立起的临时性的有组织的存在，身在其中的人们彼此分工又相互沟通合作以共同完成一项具体的活动事务（尹广文，2019）。曹海林在探讨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时，将公共空间定义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在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物理空间，如寺庙、祠堂等传统乡村公共空间；二是物理空间内所蕴含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社群组织、人际交往活动，如企业、村委会、红白喜事等。他认为公共空间可划分两类：一类为行政权力主导建构的公共空间，用以开展各类正式的交往活动，象征国家权力，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倾向；另一类为村庄内部因传统风俗或日常生活所需而自发形成的内生型公共空间，具有强烈的地方民间特色（曹海林，2005a）。

吴理财在探讨农村社区认同及重构的问题时指出，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孕育农村社区认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认同重构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出发，从建设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开始，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最终形成社区公共文化和基本认同（吴理财，2011）。从城市规划视角出发的观点认为，公共空间内发生的活动大致分为三类：必要性活动，如日常必须从事的活动，如耕作、购物等；自发性活动，即人们自主自愿参与的活动，如驻足参观、散步等不与他人发生交流的活动；社会性活动，即依赖他人参与的各类活动，如讲座、展览、游戏等互动交往活动（盖尔，2002）¹³⁻¹⁷。社会学观点认为，社会与空间是一种辩证交互的关系，社会形塑了空间，又被空间所塑造，是社会关系建构与社会秩序生成的抽象空间（谢丽丽，2017）。

Copyright © 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交往行为受信息化和网络化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不仅仅发生在线下的物理空间，同时发生在线上的数字空间，数字空间虽然没有物理空间的边界性和实体性，但其存在却是真实无误的（刘少杰，2019）。在网上对话、开会、交流与争论等成为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使人实现了生活的场景迁移。牛耀红从公共传播视角出发，认为互联网时代，乡村亦逐渐成为网络化社会，互联网成为建立村民关系的重要媒介（牛耀红，2018）。刘展提出，在农村“空心化”现实的背后，“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越发凸显，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已经深入当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手机与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原来的村民可以实现跨越时空的“返乡”，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城市打工者，也在媒介技术的互联下，保持着与家乡不间断的联结，实现着对家乡的远距离“在场”（刘展，2015）。

简而言之，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得以聚结在一起的方式，具体指社会中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连接形式（牛耀红，2018）。列斐伏尔将社会活动空间化，指出社会活动通过生产出一个适当的空间，在总体上与一种实践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2015）⁵，空间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置身乡村社区，社区公共生活的发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中国乡村社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影响社区教育的发生与发展。而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学习的场所，亦是多元主体参与公共生活的公共场域。在村庄中，共同在场的关系对村庄社会秩序的生成起到极大的整合作用，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交往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区整合，并派生出新的社会联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新村民入住后的村庄公共生活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公共生活的改变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由于社区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多样，学习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的任何互动之中。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可以是具体安排好的系列课程时间，亦可以是一次路上偶遇时；学习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区空间，比如图书馆、村民委员会办公室、艺术家的私人工作室、广场、客栈、酒馆等；学习可以任何形式呈现出来，如定期举办的讲堂、夜校等正式的有组织的学习分享，自发的在图书馆的自主阅读，新老村民相互提供生活建议的闲聊，合作发展乡村经济的讨论会议等。由于形式和内容的复杂多元，社区教育的具体发生情况难以量化，以定量方式仅能统计部分教育特征显著的社区活动，却无法评估社区交往过程中的教育效果。因此，笔者选择质性研究方法：首先以个案研究方法选定明光村作为研究对象；随后通过“个人—社区—村庄—社会—国家”的研究范式，借鉴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聚焦乡村社区形成过程中社区学习氛围的形成以及学习动力的发掘；由微观个体研究入手，通过田野笔记、口述史、个人生活史、叙事研究、参与观察、微信民族志等方式分别对具有代表性的新老村民进行访谈观察，探索新村民选择明光村的原因及明光村因他们的到来而发生的变化，以及老村民的日常生活、老村民如何理解村庄发生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对生活的影响；通过与文献对话的方式将视野聚焦于中观、宏观层面，以寻找明光村社区教育发展的普适原则与方法，为社区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1. 叙事研究

叙事的描述旨在表明这样一种立场，日常生活的世界不是由帕森斯式的社会学概念构成，也不是由解释人类学家的诗意想象构成，而是由普通的个人活动、言语、思想、情感构成，是一幅复杂交往的画卷，社会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如实地描绘这幅画卷（周勇，2004）⁸⁻⁹。本文通过访谈获得真实丰富的叙事资料（其中包含口述史、个人生活史），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日常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帮助笔者理解与明光村结缘的新村民的成长历程、他们与明光村相遇的原因及老村民对社区变化的真实反馈。

©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2. 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田野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者将自身置于立体的实验场景中,参与在地的复杂文化活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观、客观世界产生互动作用,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逐步实现心理层面与思想层面对异文化的接受与理解。研究者不仅可以参与观察法当作一种方法论,亦可以将之作为一种理论框架用以构思研究内容(蔡家麒,1994)。笔者认为田野研究本身最困难的部分是研究者与自身的和解。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又是最无法被外界控制的因素。人的主观性是隐匿的,在多数时候可能研究者自身都无法意识到潜意识中的预设、偏见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正如解构主义提出的质疑:现实往往是再现、解释和扭曲的结果。当我们自以为在考察一种对现实的忠实反映时,实际上只涉及了一种关于现实的或多或少有些偏颇的解释(Dani,2001)。

笔者在田野中不仅带有调研目的,同时带有发展目的,不仅是置身田野的“旁观者”,亦是在场的“参与者”。笔者以访谈、叙事研究、观察等方式了解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在客观理解社区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为明光村提出发展建议,由相关负责人采纳建议并落实推进。由于个人定位的要求,笔者在明光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着一种“出离感”,尽量不使自己直接介入社区的建设,因此进入田野的过程始终存在一种界限感。这种定位可以使笔者保持研究的相对客观性,但对于作为社区成员形成紧密信赖的社区关系亦存在一定的影响。

3. 微信民族志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微信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大大增加,尤其是在原本相对闭锁的乡村,微信群的建立和通信设施建设的发展使一部分日常生活从线下转移至线上,尽管线下的生活仍旧坚固地存在着,但无疑我们再也无法忽视微信空间所提供的开展田野工作的机会与可能。赵旭东教授提出了微信民族志研究方法,将人类学民族志的概念加以扩展。微信界面的参与观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志。而这

种民族志在整体特征上是碎片化而非完整系统的（赵旭东，2017）。

明光村通过微信建立了“明光村村民群”，由政府成员、新村民、老村民等积极分子共同构成，他们在群内分享明光村的琐碎生活片段，聊天主题广泛庞杂，不仅涉及生活琐事，亦包含社区公共问题的探讨。明光村亦拥有自己的媒体公众号“生活的理想村”及网站，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明光村最新动态。此外，新村民的普遍特征是不仅以个人公众号或朋友圈发布明光村日常生活细节，其中一些企业或公益组织的创始人亦通过不同的组织平台发声，如最早进入明光村的新村民方远，曾出版多本随笔并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他的众多粉丝通过公众号“方远的日光”知道了明光村。明光村项目组组长秦珂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珂村长”，用以分享个人视角下的明光村生活。微信空间表现了社区成员身份的多重性并呈现出不同维度的明光村，这为笔者观察明光村社区的内部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田野素材。笔者持续两年跟踪明光村的各类资讯，通过关注与明光村有关的各类网站及新老村民生活动态来了解明光村生活图景，尽量保持在线上社群中持续“在场”。

微信群聊天与新村民自己发布的文章所传递的信息不同于面对面聊天，笔者无法看到一些人的具体神情、动作，因此可能会有一部分文字信息具有部分“隐匿性”，无法呈现村民完整的表达，可能存在信息不全的问题或有被误读的风险。因此笔者在引用线上田野数据时尽量引用原文，避免个人解读或补充，真实还原“现场”。

（三）研究地点——明光村

1. 村落概况

明光村地处彭江、Q市、雅安交界地带，距C市有80多千米，由高速公路1.5小时可达村庄。全村面积6.78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46.2%，耕地面积3470.41亩，辖15个村民小组。全村723户，2218人，其中，劳动力1361人，党员74人，村社干部20人。2008

年，明光村还是贫困村，主要生产水稻、玉米，每亩地最多收入 1000 元，而引入雷竹种植后，一亩雷竹可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截至 2013 年，明光村有 7000 亩雷竹、3000 亩茶树，初步形成了以茶树和雷竹种植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0857 元，全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明光村处于典型的川西林盘，农家宅院深藏于茂密的林木间，外围耕地将林盘包围，从独居式林盘到聚居式林盘都体现了“田—林—宅”的空间景观模式。村民的房屋毗邻自家耕地，日常耕作便利，宅院周围栽种的林木果蔬不仅为生产生活提供原料和产品，更创造了一个绿色的人居环境（方志戎等，2011）。自种植雷竹和茶树以来，茶山竹海为村子增添了一抹雅趣。

2013 年“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中，明光村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得到重建，当地政府整合特色小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为明光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市、县的各级领导人情怀浓厚，提出“安居、乐业、家园”的建设理念，为明光村产业升级与发展明确了基调，希望以四川唯一“活着的邛窑”为基点撬动当地文化资源，打造创意旅游，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

明光村地处四川高岭土储藏量丰富的区域，资源条件非常优越，亦有邛窑遗迹。上张碗厂窑址位于明光村十二组，截至 2008 年，该窑 300 年不曾断烧，“5·12”汶川地震中厂房及窑炉受损，旋即停产，停产之前这里还有窑工十多人，主要生产碗、罐、钵、灯盏、杯、四耳缸等。四川当地某著名陶瓷品牌创始人在四次组织各地陶瓷专家团队到此考察探讨后，由时任彭江县政协主席的涂未引荐，向政府提出了关于修复这口老窑的具体方案。2014 年项目发起人因个人原因退出后，项目重新由政府牵头梳理，涂未作为操盘人，组建以秦珂为组长的项目组，重新整合资源，以土地和房屋作为引进新村民的硬件保证，并为新村民设计出两套进村方案。一是老屋出租。村庄里部分宅院主人常年外出务工，院落闲置，亦有部分房屋有人居住，其位置与格局较好，改造后便于经营。项目组系统盘点在地房屋资源，

与房屋主人协调出 10—20 年租期，根据符合引进标准的艺术家的具体产业需求介绍相关房屋资源以供选择并予以一定补贴。二是房屋自建。政府将两次震后建设用地指标全部调剂至明光村，共计 187 亩，并按照三个组团定位不同功能，划分出 17 个地块，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有 40 年产权，有意购买土地的新村民可通过土地招拍挂手续获得土地自建房屋。这两套方案为明光村“安居、乐业、家园”的生活理想提供了建设基础和制度保障。

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引资本下乡，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外部，却忽视了村民们的基础需求以及在地村民建设村庄的主体性。项目组聘请的村庄风貌设计师梁权在多次走访村落后发现一处十户人家的生活聚落——陈家塆，区域不大，与明光新村相对。新村是新建设的聚居点，但离村民自家土地太远。梁权觉得新村可能解决了安家问题，但却谈不上乐业。他理解的乡村应当以传统的院子为主，离村民的耕地很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因此他提议与新村呼应，做一个“在地建设新农村”的微村落探索，以荷塘湿地为风景，设计一个环绕荷塘的微型社区。涂未听了这个想法后高度认可并整合政府多部门资源支持项目发展。^①

明光村在治理顶层设计上采取双线平行机制，呈现出对所有利益群体都一视同仁的基调。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学习也在新旧两股力量的融合过程中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新老村民的日常交往成为必然，交往本身亦是新社区形成的基础和黏合剂，村民在交往中彼此了解，在交往中碰撞思路，在交往中培养信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共识。交往，本身就是学习。

截至 2017 年 4 月，明光村引进文创项目 36 个、艺术家和文创人士 100 多位、带动村民发展创业项目 27 个。原本以种植各种农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村民在新村民进入之后开始对各种项目产生好奇，具有学习精神的一批老村民开始在与新村民的日常生活互动中，

① 涂未访谈记录（2016 年 12 月 3 日，J9 市）。

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寻找增加家庭收入的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城市居民、乡村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关注乡村社区发展的趋势亦使乡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原本生活空间相对封闭的中国乡村成为多元经验交汇的场域，日常交往中的相互学习则成为促进新型乡村社区融合、共治、发展的重要手段。

综上，明光村在政策先行的基础上充分采纳各方发展建议，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即将新老村民看作生活共同体的典型村庄，因此笔者选取它作为研究地点。

2. 田野地点的空间限定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区概念逐渐向虚拟社群延伸，日常生活方式亦突破了原有的空间限制而变得更加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新乡村社区更加开放，在此有必要明确限定互联网语境下笔者所描述的田野地点的空间界限。

明光村的新村民来自全国各地，老村民亦有部分外出务工，且因互联网带动了更大范围的资源互动，如果将明光村联结的所有社会关系理解为一个社区，其范围过于广泛且难于掌控，所以，本研究仅将明光村视为乡村建设领域的一个资源节点。这个资源节点指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中发生聚合，通过物理空间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网络形成的相对闭合的线上社群。物理空间的社区限定为以甘泉镇文化站即“石花房子”为起点与终点的 7.8 千米长的柏油路线所串联起的所有村民聚居空间，包含新村民聚居地、明光新村、陈家塆、茶山竹海松林保护区以及散落于环线周围的基础设施（停车场、明光食堂等）、民居、民宿、餐厅等，并不包括甘泉镇所辖镇中心的基础设施（医院、学校）。社区教育行为仅限于笔者在明光村范围内的研究对象或明光村作为整体而与外界发生的“对话”，如北京“798”的明光村展览、C 市创意周的展览以及明光村品牌店等。相对应的线上社群即指生活于当地物理空间内的村民的线上生活互动，以明光村新老村民的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为主要线上田野内容。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四) 调研过程

自2015年12月至2017年12月,笔者共在地走访明光村及周边市县村落6次,在明光村在地观察时间共计2个月,在地走访期间共访谈20余人,其他时间以参与观察方式进行互动,同时保证通过各类线上媒体了解明光村发展动态。后于本文撰写之际回访了村中相关负责人以了解村庄近况。

在田野调查中,2个月时间不足以表明“在场”的说服力,笔者又通过微信民族志方式在线上持续观察明光村发展动态,试图通过对碎片化资料的整理复原在地互动。笔者完整保存了微信群内的聊天记录,以了解村民日常关注的普遍问题及如何在交流中求同存异;根据聊天记录整理线上田野资料,并收集新村民通过个人公众号发布的关于村中生活的文章及新村民对外接受采访时的访谈文章,另外还有山爱共读荟^①公开的年度工作总结、讲堂及夜校等的课程总结回顾等。

本文所涉及的村庄名称与访谈对象名称均采用化名,以保障隐私安全,相关田野数据线上资料名称亦做相应修改。

二、村里的“坝坝头”——环线上的公共空间

明光村的空间规划属于顶层设计,规划先行的发展思路使明光村的乡村空间具有整体性。以“石花房子”为起点、终点,5米宽、7.8千米长的柏油路环线,毗邻树林、农家与田地,干净利落地给村庄画了一个圈,彰显着一种空间上的界限感。“石花房子”,这座坐

^① 山爱共读荟是民间公益性阅读推广机构和乡村创新服务平台,由涂未及其四位好友联合发起,创办于2012年4月,总部在新火古镇,现有8家公益书馆,托管了12家农家书屋,有32个流动书屋服务点位(含老人读书服务点位)、8万册藏书、477名注册志愿者,已有超过20万人次受益。山爱共读荟用公益加文创的发展模式助推幸福美丽乡村建设,倡导“免费阅读,创意乡村”。

落在村口的综合文化站仿佛一种标志，承载了彰显地方精神的责任与使命。相较明光村原来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环线成为村庄主干道，串联起集中安置老村民的明光新村、新村民即将进入的陶艺手工艺文创区、林盘民居的新老村民院落、茶山竹海松林保护区等，而在所有这些区域里，都能找到明光村的“公共空间”。

（一）明光新村的活动场所

在设计村庄环线之前，散居林盘的村民们就有一大部分响应号召自愿搬进了集中安置区。安置居民的新村已经没有了传统村落自然形成的公共空间，如寺庙、祠堂，取而代之的是集镇思路下设计出的广场和活动室。新村旁边有一汪明光湖，湖对岸是给村民休闲散步、开集市或者办坝坝宴的公共广场，叫春笋广场，一大片水泥空地上安置了一些社区居民的健身器械。新村有类似联排别墅的房子，街道设了村委会和活动室，迁居新村的人们在农闲时习惯在自家门口摆上凳子和邻居摆“龙门阵”，有些人则选择到活动室打麻将。村委会门口也有块空地，平日里村镇文化站会组织播放“坝坝电影”。每家院门口都有一小块不大的菜园，尽管因被水泥地面围起来显得与乡土气息有些隔阂，但村民依然喜欢在这块小园子里种菜种花。新村在空间的设计上考虑到了交往的需求，这些旧邻里搬来后依旧可以在坝坝头聊天喝茶。

一些新村民买了地，但盖房子需要时间。为了融入他们的新家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租住在新村里。毛豆一家、阿予和她的女朋友、熙莹都是如此。住进新村三个月的熙莹曾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这样描述她的乡村生活：

某天家里有五六个朋友围坐晚餐，我开小差蹲在门口看小花园，一个村民路过问“那个白色的是什么花？”我说“是茉莉花，很香。”摘了一朵递给他。他接过花站在门口看着吃饭的几

个人，然后走进门搬个凳子坐下来。屋内小桌子已经没法再挤下客人，也没计划招待生客，情形有些尴尬。我听到屋里人与村民寒暄了几分钟，客气地请他下次再来耍，他就走了。^①

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仍然保留着如此简单的邻里关系，村民不羞于交流，自然而然地攀谈，尽管大家还不熟悉，亦没有什么共同话题。项目组组长秦珂也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她家在彭江县城，此前都是每日通勤，周末的时候带着在县城上学的女儿回村里玩耍。自从住在这里，她跟新老村民也有了更多日常交流的机会，这让闲不住的她无时无刻不寻找机会让那些可能听懂她说话的老村民知道这个村庄可能发生的变化，给那些愿意改变的村民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外界资源。

（二）文化地标——“石花房子”

“石花房子”集甘泉镇文化站、游客接待中心、明光村项目组工作办公室、旅游合作社办公室、展览馆、明光书馆、会议室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明光村极富现代性意味的文化符号。明光书馆由甘泉镇龙泉社区书屋和新民村、明光村农家书屋合建而成，首批征书3000册，全部由社会捐赠。2015年年底，明光书馆由山爱共读荟、享思联盟和明光村新村民联合托管，免费向新老村民和游客开放，推出明光讲堂和明光画室等公益活动。作为明光村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石花房子”成为明光村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的公共区域。

“石花房子”的设计师是最初的项目发起人李牧请来的上海设计师史安华。涂未跟史安华说，他曾经沿着穿过明光村的滨水河步行30余千米，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以河流串联起整个彭江县的文化内涵。文明源于河流，何不就用滨水河的石头砌一座房子，史安华这

① 摘自熙堂的《星空一直挂着闪电：返乡札记》（2016年8月4日）。

样想。基于这样的设计灵感，他以散落于田间的七朵花瓣为意象设计了这座房子。^①

因“石花房子”集办公、展览、会议、阅读等功能于一体，所以身处其中的人总是感到很充实。这里的人要么在接待来访的学习参观团，在沙盘边介绍村庄的前世、今生与未来，要么在办公室处理着新村民聚居区盖房子的琐碎事宜，要么在介绍或观赏新老村民中的艺术家及其好朋友们的艺术展览，要么在这里练习声乐、表演昆曲或读书画画，要么自发组织学习沙龙，等等。作为公共空间亦作为文化符号的“石花房子”，履行了它应有的公共交往功能。这里接纳了众多的文化类型，使人不禁觉得，这个村庄或许可以将艺术“种”在土地上，让艺术与乡村相结合。作为明光村公共艺术教育基地，“石花房子”整合资源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本地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也对培育本地区未来的艺术人才起了重要作用，更为明光村持续地进行社区营造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私宅的改造——陈家垅里的老院子

在陈家垅被改建为微村落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外地人来过这里，这里的居民就守着自己的宅院和宅院背后自己家的竹林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梁权想要通过将这十户人家纳入在地新农村建设的改造项目并支持他们自主发展民宿、餐饮等服务型产业时，多数人家只是观望，不知政府要做什么。^②起初无条件支持微村落改造计划的，只有张大爷家和王大爷家。张大爷家是做工程的，就是在村里给村民们修房子。从听说村里要搞建设起，张大爷就不遗余力地支持。陈家垅起初规划时并没有做厕所的安排，他发现了这一缺陷。笔者第一次去时就看见他把自家猪圈拆了，说要改成可以供客人们使用的公共厕

① 史安华明光讲堂分享（2018年9月8日）。

② 梁权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8日，明光村）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所。他家也想办法做起了家常的豆花饭生意。^①王大爷在村里做了几十年的九碗^②，是村里有名的厨师。他家地处荷塘边，他凭借自己的一手厨艺开起了“柴火鸡”餐馆。笔者第一次去他家，尝了他自己熏的腊肉。王大爷、张大爷两家是邻居，门前总是有走地鸡，张大爷家门口还有一棵漂亮的柿子树，于是笔者第一次见到了圆圆的柿子。^③

很长一段时间，明光村里可供吃饭的地方只有这两家。起初这两家只是敞开了自家的院子，在砖房里支起简易的饭桌，放上塑料板凳，像极了农家乐，后来随着客人越来越多，必须改造一下。王大爷在自家后院的竹林里垒起了烧柴的灶头，柴火鸡要预订才能吃到，餐馆内部也随即做了装修，看起来更加整洁舒适。^④张大爷为了美观，把自家院子里的猪圈也拆掉了，让院子看起来更敞亮。他还在屋顶种起了花，搞了个屋顶花园。^⑤就这样，原本是自己家院子的私人空间变成了迎来送往的公共场所，来过参访的官员、教授，来过专门采访他们的电视台记者，也来过随性游玩的诗人、歌手……

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两家最先经营的餐厅赚到了钱，陈家塆的其他几户人家也开始跃跃欲试了。2015年下半年，荷塘边的一户人家把自己的宅子全部拆了，几个姊妹筹集了100多万元准备重建一所大房子，开一家民宿。陈家塆最靠近环线的罗大哥家也准备重新装修自家的房子，开餐馆、办民宿。

自家的房子如今成了自己的生意，空间呈现的是自家的形象，大家便分外用心。整体规划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赚钱机会，乡土景观的主要建设者——村民们，才真正开始动起来。顶层空间规划设计带动原村民主动参与房屋建设、改造自家院落房屋风貌，这是明光村在空间

① 张大爷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6日，明光村）。

② 九碗，原以蒸菜的九大菜而得名，是四川特色菜肴，亦被当地人称作坝坝宴、流水席、九大碗等。笔者走访得知九碗有固定菜品，亦可根据需求有所调整。

③ 田野笔记（2015年12月18日，明光村）。

④ 王大爷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6日，明光村）。

⑤ 明光村村民微信群聊天记录（2017年4月5日）。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变革上做出的极好的引导示范，虽不能尽善尽美，但一切都在发生。

此外，梁权设计的公共空间也在不断产生新的变化：荷塘边的空地铺上沙子、装上跷跷板，成为村里小朋友的微型游乐场；空地上的集装箱，成了明光村制陶手艺人雷大爷的另一个拉坯作坊，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和他一同玩泥巴；荷塘中间的竹房子原本是旅游合作社经营的烘焙工坊，后来由一位新村民租下来改造成了酒吧，成为城里来的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这里经常会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开音乐会，使愿意来喝上一杯精酿啤酒的新老村民多了一些文艺休闲生活。

（四）有趣的陌生人——新村民的“家”

基于入村的强制条款——新村民必须引入产业，与当地村民发生互动，带动老村民实现生计提升，明光村新村民无论是在环线周边租用老村民的民居进行改造，还是在新村民文创聚落区重新建屋并引入自己的文创项目，其最终所呈现的物理空间均须对老村民和来访游客开放。与传统村落以寺庙、祠堂、村委会作为公共生活场所不同，相对封闭的环线串联起来的新村民的“家”，除了自住的部分，几乎都是开放的。

盘整土地需要时间，为了让村庄能够尽快“活”起来，盘活老房子、让一些新村民抓紧时间住进来，是政府推动项目的重要手段。李牧离场导致的项目变动让涂未陷入被动，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曾经说，作为操盘手，喜欢的事情要做，不喜欢做的事情也要做，而且要做好。所以，在明光村出名之前，他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社会资源，去发现和引进可能的新村民。2014年，他成功通过老宅改造引入了C市知名文创达人方远、工美艺术大师穆子卿。客人初到明光村，秦珂带人参观的必经之处就是方远、穆子卿改造的房子。笔者到村子的第一个晚上，一个叫寒石的流浪画家带笔者去了另一个地方。

寒石瘦瘦小小，头发很长，头顶盘个发髻，其余部分的头发仍然是散的。他的双手因为染布染上了深蓝色，可能平时会摸一摸脸，远

远地看去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幽幽透着蓝光。他眼神锐利，目不斜视。方远有的时候，他只对方远笑。他是借住在方远租的那个老房子里的流浪画家，贵州人，会扎染。他从任博古镇得知明光村这边在发展，慕名而来并爱上了这里。他因为四处流浪，没有积蓄，置不起地，也租不起房子，但他画得一手好画。他跟方远说他在这里做个染坊，一边帮方远看房子，一边赚点生活费。他不是秦珂的目标客户，但对于他的到来，村民们也很欢迎。^①

刚来村的第一个晚上，笔者不知道去哪里吃饭，寒石热情地把笔者带到了“朴舍”，笔者也因此认识了大毛哥。大毛哥是朴舍的主人。刚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好骑着自己的大摩托车从镇上买包子回来。他原本在任博古镇经营酒吧，因此也有一些政府资源。之所以给屋子取名“朴舍”，是因为他觉得这间屋子应该是朴朴素素的，是回归乡村生活本真的居所。院子里挂了个牌子，写着“乡新会”三个字，这是一个乡村设计师联盟。他直言不讳地跟我说，因为“官方”认为应该有个组织，正好有一群年轻的设计师朋友热衷乡村生活，所以就应“官方”要求先建立起一个公益联盟，尝试把这个联盟经营成乡村建设的智库，未来也可以做乡村创业项目。^②

2015年3月得知明光村有项目机会，大毛哥就来了。秦珂他们选了很多老屋，供想来村里的“准新村民”选择，最终他选了一间藏在竹林里的残破老宅。房子租期15年，先期进村的新村民有政府给的30万元的补贴用于房屋改造。大毛哥说这间房子改造花了50万元左右。这间老屋对老村民来说就是个被废弃的地方。“这个城里人租来能有什么用？”村里的老村民们曾经这样质疑。

说到房屋改造，大毛哥略显骄傲。他说多年来他对乡村有很多思考，趁着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实践。他通过寒石认识了一位女设计师，多年从事乡村建筑设计研究。他们在这个院子里设计了风雨廊和类似

① 寒石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6日，明光村）。

② 大毛哥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9日，明光村）。

枯山水的鹅卵石景观，把原来的房顶改造重铺，改建成了一个有落地玻璃的办公空间，并尝试设计化粪池等等。老屋的改造引来了老村民的走访与围观。改建期间大毛哥请了一些当地工人当杂工，最开始这些工人都嘀咕“这是个什么鬼地方”“能改造出个什么名堂”。随着改造的一步步推进，他们看到变化后觉得不可思议，就开始口口相传。大毛哥说刚改出样子的院子经常迎来一波一波的老村民，他们就像赶集看大戏一样来参观。只要是农闲的时候，早上、中午、晚上都有人过来看这所破房子变成了什么样。他这样总结房屋改造的工作：“一开始这个项目并未受到大家的关注，尽管一些地方不够细致，起居上略显不够舒适，但整体上仍是瑕不掩瑜。”^①

像大毛哥一样进村的新村民都会遇到这种情形，老村民们好奇，有什么新鲜人、新鲜事都会争相去看。对他们来说，这些城里人是有趣的，他们好奇这些人如何一步步地让废弃的老宅焕发新生。新村民院落的部分改造工程是由当地农民负责的，而改造完成后，这些院子和他们的新住户便成了老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就这样，不管是新村民租住的老宅还是核心区建造的新居，老村民都有意无意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五）手机上的龙门阵——村民微信群

村子里的很多新村民在城里有自己的事业，很难像老村民一样常年聚在一起生活并成为熟络的街坊，互联网则将分散的村庄成员集结起来。作为热门的智能手机软件，微信的群聊天功能将大家聚到一起，实现了新村民的虚拟化共同在场。微信群对于离散化村庄的意义在于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人群通过虚拟在场实现重新聚合。随着现代性的浸润，村落社区呈现出“分化”与“断裂”特征“一是各类社会主体自身自主权扩大，对政府的依赖性降低；二是社会结构分化速

① 大毛哥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9日，明光村）

度加快；三是新的社会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四是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大大加快；五是中介组织涌现，价值观念多元化等。”（井世洁等，2015）明光村明显具有以上五种特性。新村民来自不同行业，拥有篆刻、布艺、陶艺、皮影、国学、茶艺、饮食、自然教育等不同方面的特长，对生活与村庄的需求丰富多元。

社交媒体的“行动”与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体身份或认同的“集体性行为”不同，是建立在媒介动员基础上的行动网络。特别是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重合时，虚拟社区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线上线下动员，最终促成集体行动（王斌等，2014）。第一次走访明光村后，秦珂把笔者拉进微信群——“明光村新村民”。起初群里只有不到百人，除了跟项目相关的政府领导和项目组工作人员，其余基本都是“准新村民”，他们要么已经决定买地，要么已经租好了民居，要么就是正在筹划进村。渐渐地，群里像我这样既没有买地也没有租房的朋友越来越多，这些人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新村民”。他们有的是新村民的团队成员，有的是新村民的好朋友，有的是秦珂等人在其他学习活动中认识的乡村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有的是做旅行、公益事业的青年领袖，有的是慕名而来的在读大学生，等等。再后来，一批老村民入群，群名也随之改为“明光村村民群”，群里的老村民并不多，但都算是村里的“意见领袖”或“先进代表”。他们要么是立志推广生态农业的返乡大学生，要么是村委会成员，要么是村民合作社的骨干成员，要么是返乡回家再创业的村民。这批人参与日常沟通的活跃度不高，但他们在群里的旁观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新村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对新村民的种种理念以及未来乡村发展的方向相比其他村民来说理解得更加深入，算是老村民里的“明白人”。当然群里也是人来人往，一些最终确定不留在村里的人选择了退群。自笔者进群至今，从未发现群里有明确的微信群公约，群里的话语秩序却在沟通中自发形成了，鲜少出现与村庄发展无关的内容或话题。这样一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形式，给了新老村民更多话语沟通的空间和自由，使他们有机会就村庄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和平等对话。

微信群作为村庄网络公共空间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参与社区建设的目的，成员讨论某一特定话题时，便顺势构成了一个合作领域。微信群的存在强调了交往过程中“讨论”本身的重要性，讨论即是参与，参与本身就是形成新社区秩序的重要过程，讨论本身亦是共识形成的重要基础。

明光村村民微信群成为村民进行讨论、分享以及日常闲聊的重要场所。群内探讨的问题从现实到理想层层递进。起初新村民进入村庄有很多现实烦琐的事务要处理，比如租房协议、土地拍卖、水电供给等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以通过微信群随时与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随着越来越多新村民住进村子，他们探讨的问题也变得更加深入。新村民本身带着各自的目的来到村庄，对于村庄的未来走向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他们在微信群中对于共同关心的诸如生态农业、垃圾分类、在地经营准则等等多个社区发展公共议题进行探讨，共识性建议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线下讨论后随即在村中得以实践。微信群成了新村民发现问题与机会、探讨未来、碰撞观点、寻求共识的公共空间。他们通过日常聊天促进社会资本联结，为线下互动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村民的日常交流促进了邻里关系发展，项目组工作人员亦可在其中了解不同诉求，根据讨论内容更加客观全面地掌握信息。良性的互动确实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新老村民对自己家园的共同体意识。

三、学习平台的营造

（一）亦“营销”亦“学习”——明光讲堂

制订好先期的顶层计划后，县领导和明光村项目组定下了一个

“最简单粗暴”的目标——2016年，引入新村民。说白了，就是要让新村民来村里租房子、买土地，但前提是让人知道这里有个村子，山好水好人也好。最开始秦珂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把明光村发展思路做成项目文件，自己一趟一趟从彭江跑到市区，慕名拜访一位又一位可能的目标客户。笔者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说，有一次跟一位司机师傅一起去市里，谈项目谈了一天，司机师傅在车上坐了一天，回来的路上自己坐在车里大哭，司机师傅安慰了一路。可见最初让别人认识并认可这个小村庄，是多么的不易。方远、穆子卿等人的到来以及微村落的构建意想不到地得到了政府层面的高度认可，才让村庄的名声“旺”了起来。2015年上半年，明光村已经在C市小有名气，然而掏出真金白银还乡置地的新村民还不多。为青年人服务的享思联盟，在明光村此后的“营销”工作中算是帮了大忙。

王吉光先生，原四川师范大学英语教师，从教20年，任教期间做过多种尝试，以期帮助学生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他在课上选择多种影视素材拓宽学生视野，在课下与同学共同创办享思英语网，打造英语学习交流平台。

2009年，享思英语网开始举办线下活动，召集热爱英语的人和在校大学生，定期举办英语沙龙，逐渐积累起人气的沙龙活动受到众多青年关注，但是一次意外让王老师意识到青年人普遍比较焦虑。一位经常参加沙龙的年轻人创业未果，患抑郁症后自杀。2011年，他将沙龙改成TEDx模式，并与台湾公益人联合创办“享思塾”，每期活动邀请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就统一主题进行分享，为青年人提供解答疑问的不同视角，却不设定任何标准答案。2013年，享思联盟公益发展中心注册成立，次年他便从大学辞职，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多年来，享思联盟聚集了一批渴望思想、善于思考的年轻人。

山爱共读荟和享思联盟都是鼓励青年人分享交流的学习平台，所以王老师与涂未常有来往。明光村项目刚刚起步的时候，他们经常思考是否可以通过两个平台为明光村做些什么。他们想，两家机构不妨联合在明光书馆举办一系列分享交流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明光村，了

解明光村。于是就有了最初的明光讲堂。^①

明光讲堂是以乡村为主题的专题性系列讲座，合作为期一年。他们在享思联盟的官方公众号介绍中这样总结道 “明光讲堂专注乡村文化、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和新村民代表进行主题演讲和开放对话，提升明光村治理水平和整体发展、参与美丽乡村基层文化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

尽管在讲堂的介绍中没有体现 “营销” 的目的，但明光村希望借助享思联盟的社群影响扩大自身知名度是非常现实的需求。将青年学习与分享的场景带到村庄，就有机会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2015 年 11 月 20 日，明光书馆开馆，举办了第一期讲座，题目为 “众创年代，何处寻乡愁”，讲者是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培训中心的一位教授。那天正好是全国美丽乡村论坛在 C 市和彭江召开，农业部官员和各地代表专家来到村里并认识了这个村子，村子的顶层设计理念得到了参访团的高度认可。用秦珂的话说，这一天在四川主流媒体和政府层面，明光村可谓声名远播。^② 那个时候没有人真的相信上海的一个设计师会突然来村里买下一块地，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明光讲堂的第二期讲座的嘉宾将是一位省外来的 “新村民”。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讲座准时开始。除了村里的老村民、县里的领导和已经租住进村的新村民，从 C 市赶来的年轻人也比笔者想象的多很多，因为座位实在安排不开，只好委屈一些听众站着听讲。这是笔者意料之外的状况。如果不是自驾，从 C 市到明光村首先要坐大巴到彭江客运中心，然后转公交才能到村里，路上耗费将近 3 个小时。这些年轻人准时出现在这样一个交通并不算便利的村庄，让笔者很是惊讶。

赵初明的到来可谓给了秦珂等人极大的信心和动力。作为设计师

① 王吉光访谈记录（2016 年 12 月 9 日，湖南常德）。

② 秦珂访谈记录（2015 年 12 月 17 日，明光村）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和企业家，他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市场角度为明光村背书。这一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开始代表了“资本”，在一些青年人看来，资本的青睐正是机会的所在。这一刻，明光村进入了全国乡村建设的视野。^①

明光讲堂系列讲座的主题并不是经过系统设计的，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研究乡村发展的圈子不大，几乎所有乡村工作者对于国内乡村建设实践的优秀案例和知名专家学者都略知一二，享思联盟熟知国内多个从事乡村建设的公益组织；新村民付新秋从事社区营造研究十余年，她先生是乡土景观规划的专业人士；多年从事基层政府工作的涂未亦有很多本地政府资源；项目组的秦珂自操盘明光村项目以来亦踏上了海内外乡村建设学习之路，在各类分享和学习的场合一面宣传着村庄，一面将外面的学习资源带回来。学习平台建起来后，不愁没有学习内容。紧抓眼前资源，新村民先来一轮分享，新村民串联的专家朋友再来一轮，秦珂在全国各大论坛上认识的专家再来一轮，一年的十二期活动，就差不多凑齐了。在某种程度上，明光村聚集的知识资源都被秦珂纳入村民微信群里了，村民微信群变得越来越像促进村庄发展的智库组织。

明光讲堂的功能是对外的：一方面是宣传，通过论坛造势，持续引进有意向的新村民；一方面是学习，通过与专家、学者以及经验丰富的实践者对话沟通，扩展当地政府、项目组以及新老村民的思路和视野，将适合村庄发展的经验借鉴移植进村，从而使村庄越来越好。

2017年，山爱共读荟与享思联盟的合作到期，享思联盟撤出村庄，但明光讲堂的活动已经成了村里的标志，也成了村庄对外输出的一个“学习品牌”。秦珂身为项目组组长，亦是山爱共读荟的常务副会长。2017年开始的讲堂活动的主持人也变成了秦珂，开展主题演讲的嘉宾也都由秦珂邀请安排。

最初几期的讲堂，总有十几个村民每期必到。周大爷就是其中的

① 赵初明访谈记录（2015年12月2日，上海）

一个，他从20岁开始就是村里的大队长，为村民服务。笔者第一次在图书馆遇到他是在赵初明讲座结束的第二天。笔者要帮助村里的居民核实银行信息，正在图书馆等着乡亲们过来。那时他正在翻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自图书馆建立他就每天来读书，闲聊的时候跟笔者说起《红楼梦》，说曹雪芹的家事，说曹雪芹的智慧。他已70多岁，但眼睛依旧很明亮，不需要戴老花镜，书上的字也都看得清楚，只是看久了会觉得眼花，所以他也经常把书借走。他跟笔者分享了来讲堂听课的笔记，记得认真真。^① 笔者以为他只是一时兴起，看到村里来了新鲜人觉得有趣便凑凑热闹，却不知明光讲堂的每期讲座他都从未缺席。

（二）动员群众参与——明光夜校

与明光讲堂的功能互补，明光夜校的出现则是为了满足村庄的内部需要。2016年3月7日，由山爱共读荟主办的明光夜校正式开学。前两堂课的主讲人都是涂来，地点设在村委会的活动室，后来这个房间挂了匾额，成了夜校的专用场地。从举办的地点就能看出，这是专门为老村民打造的学习平台。夜校利用晚饭过后的时间（19:00—20:30）进行授课，居民散步两三分钟就可以走到，不收费，哪怕是凑热闹聊聊天也是一种交流。

尽管明光讲堂也经常有老村民去听课，但因为知识水平存在差距，他们对很多内容一知半解难以彻底消化。在村子里要用村民听得懂的方式说话，明光夜校显然更接地气。这里更像是一个“被翻译”后的明光讲堂，由听得懂的人先把内容学了、消化了，再慢慢于农闲时把这些东西讲给大家听。

与明光讲堂专注乡村建设理论与经验交流不同，明光夜校更关注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具体内容。然而因项目阶段不同，夜校的课程也有

① 周大爷访谈记录（2017年12月17日，明光村）。

不同侧重。2016年是举办夜校的第一年，也是明光村项目发展的起步阶段，不断有新村民进入。在这一阶段，要让村民知道村子里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不同的人轮番地讲，涂未、秦珂、县政协主任、县文广新局局长，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解读了村庄的发展，让村民知道村庄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前景。不求追随，但求知道和接纳。然而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对项目组震动巨大的事情：2016年6月，政协换届，涂未即将卸任政协职务并不再负责村庄发展。听说涂未要走，秦珂慌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像是失去了主心骨，后边的路怎么走，只能靠自己摸索。出于项目情结，涂未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乡村建设操盘手培训系列讲座，共七讲，占去了这一年夜校课程的一半。他一方面是通过亲民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基层干部的为民服务思路，而另一方面，于笔者看来更像是给项目组“开小灶”，内容实在，从做人讲到做事。这虽说是操盘手培训，实则是一场生命经验的分享。听者不管是否做操盘手，都能学到很多。不仅是山爱共读荟和明光村项目组的成员，在城市从事相关操盘手工作的人也都相继从城里赶来，哪怕因此得在这个村里过上一夜，也不愿错过人生积淀的分享。

整体而言，夜校课程丰富，内容涵盖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房屋改造、村民创业、种植、法律、垃圾分类及环境保护等，由彭江县相关领导、新村民（艺术家、自然教育学者、建筑师、规划师、专业经营者）、特邀专家进行授课。如果说2016年还有一些内容是在用宏大叙事描述村庄的未来，那么2017年的内容几乎都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盖房子、旅游合作社在做什么、如何做茶的生意、怎么经营一家有品质的民宿、有机农业的方方面面、垃圾分类与生态循环……，这里的每一堂课的内容，村民只要愿意，都能用到生活里。

2016年山爱共读荟共组织了15期夜校活动，到场参与村民达到800多人次。这一年，村民发展传统手工艺、客栈、餐饮等方面的实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体 22 家，并开始初步实践垃圾分类、厨余堆肥等环保措施。^①

（三）新村民的艺术分享与社区文化生活

有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通过培育和复兴乡村公共文化而实现村庄秩序重构的主张，以乡村社区为本位，吸引外部文化资源介入，激活内部文化基因并与之发生联动，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生活的文化再造（宣朝庆等，2016）。各类参与主体共享全新的文化价值，以提升社区认同感、推动社区发展。在公共空间中重新设定文化交往的特定活动，组织具有参与感与仪式感的社会活动能够促进社区秩序基础的生成（曹海林，2005b）。城市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相比之下乡村保存了更具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习俗特色的日常生活，乡村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亦是村庄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在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中，乡村应当时刻以保育与盘活乡村在地文化资源为己任，通过日常交往，在形成社区秩序的过程中逐步建立新老村民对在地文化的认同，以文化发展促进产业提升。

在本地文化资源的尊重与保护方面，明光村的新村民做得很好。秦珂跟笔者说，刚来村里工作的时候她天天在村里转，一位老村民冯大爷，60多岁了，看她每天都来，但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叫住了秦珂，神秘地说：“我有一个宝贝给你看一下，是一块碑，记载着明光村字库的故事。”秦珂说，明光村以前应该有个字库，像塔一样，大概有五米高。这个地方的人，写字废掉的纸张都不能扔，要放到字库里面去烧，以表示对文字的尊重。冯大爷说那个字库很久以前被毁了，当时只剩了一块碑，村民把碑拿去铺桥，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就偷偷把碑搬回家里一直保存到现在。现在村里经常有很多人来，他也不知道跟谁

① 摘自山爱共读荟明光书院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计划

说，所以就找到了秦珂。他特意把那块碑藏在一堆竹子下，秦珂去看的时候就被震撼了。碑文用小楷书成，第一句便是“自仓颉造字以来……”。第一次去看过之后，秦珂让冯大爷保存好，有机会再想办法怎么复原，可是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冯大爷发现碑不见了，可能是某个亲戚觉得是文物，可以拿去卖钱，就偷偷搬走了。^① 尽管此事不了了之，但秦珂寻找文化资源的努力一直没有停下。2017年年初，秦珂希望能够在村民中找到一些资源帮助村庄修复明光寺，但因为寺庙修缮和管理颇费时间精力，新村民的房子也要抓紧建起，此事便暂时告一段落。

迁居新村的老村民还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俗，每逢婚丧嫁娶也都会在新村的空地上摆起坝坝宴流水席，刚来的新村民很难立即参与其中，尤其是来自其他城市的人们，对地方风俗不理解，不敢轻易参与。然而明光村自带一种亲和的气质，如果你路过村里，正好有人家在摆酒，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过去坐下来，跟邻里一起吃一顿饭，临走的时候，随个份子钱以表祝福就好。2016年10月24日，笔者恰好在村里，秦珂从乡亲那儿得知新村的几个老人们邀请陈家塆的王大爷帮他们办一场祭天的“素九碗”，便在村民微信群里邀请在村里的朋友一起去。有位老奶奶，80多岁了，跟我们说她到现在已经办了40多年的九碗，请大家一起吃饭，祈祷风调雨顺、家人健康、生活美满。她有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我们听起来有点吃力但一点也不觉得生分。每逢这种场合，秦珂都会拉着项目组的所有小伙伴一起去参加，不光是为了凑热闹，也是为了能够切身感知村民的文化生活，更是为了能够与村民建立更好的关系，便于推进工作。24日临走的时候我们差点忘了随喜，秦珂提醒我们去找收账的村民，我们才想起来。^② 作为联结新老村民生活的桥梁，秦珂等人真的非常贴心。在村子里做事，要时时把村里人装在心

① 秦珂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7日，明光村）。

② 田野笔记（2016年10月29日，明光村）。

里。作为外来人，尊重当地文化，是最基本的礼貌。

86岁的雷大爷也是“村里一宝”。15岁时，他的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不巧还碰上军队来抓壮丁，他只好逃去乡长家里。乡长是个好人，把他介绍去陶场给工人做饭。于是雷大爷有了安身立命的“泥饭碗”。但他有自己的小心思“天干饿不着手艺人。”他一边做饭，一边默默偷师学艺，想把“泥饭碗”变成“金饭碗”。只要工人休息，他就去拉坯机上练习。雷大爷问师傅自己为什么总做不好，师傅怕他学会了抢自己的饭碗，根本不愿意教，只是冷冷地说“再练习练习。”雷大爷的坚持让他将这门泥巴手艺熟稔于心，做碗、上釉、装窑、烧碗他样样都会，这样一做就是70年。如今他看别人做陶器也是看得停不下来，私下里去和村里新来的陶艺家们交流，还把自己做的坯拿到火痕柴窑烧制，老窑新烧后的成果别有一番韵味。在他的坚持下，他的儿媳、孙子也继承了这门手艺。如今他与儿媳在自家二楼开了一个陶艺工坊，孙子雷勇平时在C市从事书法培训行业，周末会带一些学生来家里的陶艺工坊体验学习。^①知道雷大爷的经历后，项目组就一直视他为村里老居民烧窑的代表，村庄有机会举办对外展览，秦珂他们总会留一个单独的展位，像展示其他新农村的作品一样，将他家的作品一并展出。

然而项目组直接介入老村民的日常生活显然不合适，当下的状况无法深度挖掘历史，在不去破坏乡村原有生活节奏的原则下，只能从可及的新村民入手。新村民带着“十八般武艺”来到村里，凭借一个技能就能组织一个兴趣班。2016年一直寻找发展机会的旅游合作社社长双华找到穆子卿，希望通过陶艺培训带领一批老村民制陶，合作社可集中购买村民作品，售卖给来游玩的客人。穆子卿在村子里有两个工作室，陈家塆的那个院子更像作品展览馆，靠近明光窑的地方有一个专门拉坯烧窑的工作室，每周六他的好朋友都

① 雷大爷访谈记录（2016年6月28日，明光村）

来这里给村民们免费上课。^①

新村民组织这些培训，一方面是希望新村民与老村民彼此了解，另一方面亦希望这些培训不仅能丰富老村民的日常生活，更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机会来发展本地文创产业，带动乡村传统手工艺发展，实现增收。尽管这些培训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但就像穆子卿说的，不管怎么样，尝试总是好的。^② 2016年下半年开始，各类新民人文创培训活动按部就班开展，半年时间，陶艺培训就开展了28期，方远的草木染工坊开展了4期，另一位新村民开设的篆刻研习所以学制两年的方式开了半月一次的研习课程。^③

“我说我来这儿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教会村民做陶艺。这儿有两个产业很好，一个就是种茶叶，茶叶和陶器是最搭配的。原本明光村是没有雷竹的，它是引进的；茶叶也是没有的，也是引进的。正因为引进了这些东西，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面貌，他们今天才变得富有。我们想把陶艺引到明光村，岂不是可以提高茶叶的附加值吗？村民生活也能有更高的品质。从2016年开始每周六我们免费给村民进行陶艺培训，到今年三年了，做了一百多期。”穆子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几乎每个周六，他的好朋友代老师都会来村里，每个周末笔者在微信群里都会看到村里一群老老少少玩泥巴的照片。2017年7月22日，穆子卿在群里兴奋地说，这一天村民做的陶艺作品，全部被合作社收购了，其中一个作品就是上了电视的村里小朋友和爸爸合作的“石花房子”陶艺模型。^④

除了新村民的分享，项目组还煞费苦心设计了一些新老村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随着项目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扩大，政府资源也

① 双华访谈记录（2015年12月18日，明光村）。

② 穆子卿访谈记录（2016年10月20日，明光村）。

③ 《明光村社区营造实践报告》（项目组工作文件，2017年4月）。

④ 明光村村民微信群聊天记录（2017年7月22日）。

不断向村庄倾斜。2016年,明光村决定举办第一届中秋诗歌音乐会,场地设在新村旁边的春笋广场。活动前一个月,秦珂向新村民征集节目,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征集到了10个节目,有诗歌朗诵、合唱、乐器表演等。笔者看到了节目单,于是认识了一些新名字,后来得知,弹钢琴的姑娘是村里学音乐的大学生,另外还有县里请来的合唱团和艺术家,还有一群小朋友(他们都是在新村民付新秋组织孩子们玩的时候聚到一起的)。尽管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村里的新人,但是他们的观众却都是老村民。这样一场文化活动,让村里人有了更多机会了解这些新来的人。2016年之后,中秋诗歌音乐会成了村里固定的庆祝节日,每年都有。其他一些活动也随着社区需求的发展不断被推出,比如2017年举办的春笋节,渐渐也成了明光村新老村民共同参与的标志性文化活动。

四、结 语

明光村不同于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已经将一大部分村民原有的生活空间格局打破,形成大范围的类城镇化社区聚集模式,尽管新区也设有公共空间如文化站、社区活动中心、健身中心等,然而这样的改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生活样态,公共生活的方式与内容亦在空间的演变中发生了巨大改变。新村民的引进则进一步加强了明光村的“现代性”,他们带来了一种与传统村庄生活气质迥异的生活方式。曾在城市里久居的新村民无论如何喜欢村庄,也无法快速高效融入当地日常生活。因此在总体规划上,村子单独开辟了文创区,与明光新村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不相扰。这样的规划一方面规避了新老村民因土地房屋等问题发生纠纷,另一方面保障了两方生活方式尽可能互不影响。

然而新老村民又不可避免地在彼此的生活中发生交集。一部分购买土地的新村民因为短期内无法将房屋建成,所以选择租住新村的房子,与老村民成为邻居。陈家塆保留着川西林盘聚居的空间格

局，然而其新的生活内容呈现出了一种公共性，这里的居民不再是独自生活，而成为明光村的典型农户，一部分私领域成为公共空间并与外界发生着频繁的互动。租住老房子的新村民将原本隐匿在竹林深处的破旧房屋改造成可供参观游览的公共空间，方远、穆子卿向老村民提供蓝染、制陶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明光村的公共性在空间和内容上呈指数级增长，无论是村庄的物理公共空间还是空间所承载的活动内容，都极大地丰富了村庄的日常生活，开放的公共空间更能够促进老村民对新村民的观察与理解，这就为新老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融合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明光村村民微信群亦促成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员的“共同在场”，其中的所有对话都是村庄公共生活的见证，新老村民的讨论使村子形成了良好的公共议事氛围。尽管新村民是话语主导者，然而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老村民默默接收到各类资讯，并主动寻找学习与进修的机会。在非强迫的学习环境中，日常交往引发了老村民的学习兴趣，而兴趣作为最好的老师，成为他们日后参与学习的有效动力。

李增元总结了多位学者关于乡村社区建设如何通过提升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来构建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观点。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应当关注乡村社区公共利益，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本，通过增进福利或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重新营造社会关系，促进乡村社区的发展。他们主张结合传统乡土资源，通过构建乡村社区内部组织管理网络，推动乡村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形成具有内聚力、认同感的乡村生活共同体，而加强公共参与是促进社区居民交往、形成社区信任的重要机制（李增元，2012）。培育社群共同体不仅要依靠社区组织，更要鼓励居民主动参与，倡导村民在活动设计与运营过程中发表意见、提出想法并付诸实践，从“被组织”向“自组织”发展。这有利于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当代中国村庄公共生活建构往往过度关注外部力量而忽略老村民的主体性。明光村的顶层设计始终关注老村民并设计了多种参与路

径,关注老村民的个体发展与参与村庄建设的诉求。新村民进驻村庄以及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初并不为老村民所理解,因此社区教育最初的功能在于促进社区认同,努力构建社区全体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且通过各类活动促进各个群体平等对话、参与社区生活。社区教育是建构共同体的重要方法。社区鼓励新老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在平等的交往氛围中促进社区成员相互信任,增强社区参与感与融入感。这是社区交往氛围形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社区内非正式学习氛围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村庄发展的顶层设计中,政府始终将村民作为整个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尽管在项目开展初期亦有村民存在冷漠、拒绝和旁观的态度,但项目组成员始终尊重村民的选择,尊重村民的生活与思维习惯,不予强制执行。在设计学习内容时,项目组以宣传介绍项目内容以及未来的受惠图景为目的,请在乡村建设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到村内演讲,鼓励村民参与互动讨论,以期打破村民固有的心智模式,使其实现思想层面的逐步转变。

参考文献

蔡家麒,1994.试论田野作业中的参与观察法[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2-56.

曹海林,2005a.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4):88-92.

曹海林,2005b.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6):61-65.

杜威,2001.民主主义与教育[M].2版.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方志戎,周建华,2011.人口、耕地与传统农村聚落自组织:以川西平原林盘聚落体系(1644—1911)为例[J].中国园林(6):83-87.

盖尔,2002.交往与空间:第四版[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井世洁, 赵泉民, 2015. 新型乡村社区治理模式构建: 基于苏南 Y 村“村社协作型”的个案 [J]. 南京社会科学 (4): 80-86, 94.
- 李增元, 2012. 乡村社区治理研究: 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及研究视角的述评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4): 72-85, 128-129.
- 列斐伏尔, 2015. 空间与政治: 第二版 [M]. 2 版.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少杰, 2019. 从物理学到现象学: 空间社会学的知识基础转移 [J]. 社会科学战线 (9): 225-235.
- 刘展, 2015. “媒介化”乡村的“主体”在场: 东北姜东村的田野研究 [J]. 当代传播 (6): 43-45.
- 刘志丹, 2016. 观点质变学习理论: 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的当代转型: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杰克·麦基罗的启示 [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1): 147-149.
- 麦基罗, 2018. 当代学习范式 [J]. 朱莉, 译. 终身教育研究 (1): 57-64.
- 牛耀红, 2018. 社区再造: 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 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 [J]. 新闻大学 (5): 84-93, 150.
- 王斌, 古俊生, 2014. 参与、赋权与连结性行动: 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和理论意涵 [J]. 国际新闻界 (3): 92-108.
- 王家峰, 2019. 走出行政伦理困境: 一个交往理性的解释框架 [J]. 道德与文明 (5): 117-125.
- 吴理财, 2011. 农村社区认同及重构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3): 78-84.
- 谢丽丽, 2017. 村庄公共空间环境恶化的空间社会学阐释: 以西北地区 X 村为个案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46-52.
- 宣朝庆, 韩庆龄, 2016. 文化自性与圈层整合: 公共文化建设的乡村本位 [J]. 学海 (3): 63-69.
- 尹广文, 2019.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 兼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9-30.
- 赵旭东, 2017. 微信民族志时代即将来临: 人类学家对于文化转型的觉悟 [J]. 探索与争鸣 (5): 4-14.
- 赵旭东, 张洁, 2017.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 (的再调适)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 56-68.

- 周勇, 2004. 十字路口的社会学写作: 译者前言 [M]//邓金.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 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 周勇,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DANIEL, 2001.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thematic variations [M]. London: Athlone Press.